一篇光辉文献的诞生与传播

■缪炳法

记 史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收藏展陈着毛泽东《论持久战》的多个版本。这是一篇指导全国抗日战争的纲领性文献，一经发表即受到全中国社会各党派、各阶层民众以及海外人士的热烈反响和高度评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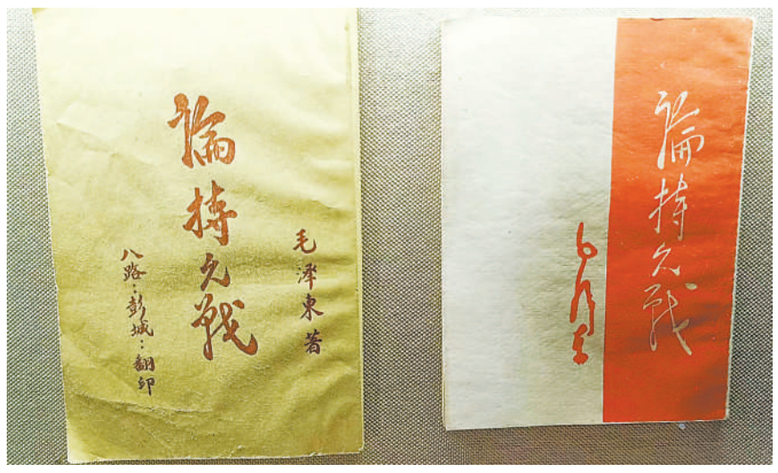
一

1938年，正值中国抗日战争的关键时刻，也是决定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紧要关头，毛泽东以其丰富的战争实践和超越常人的政治智慧与敏锐洞察力，于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了《论持久战》的讲演。

在这次讲演中，毛泽东通过对中日双方的力量对比，特别是对时代特点的分析，揭示了抗日战争的规律，精辟地论述了抗战的前途、历程和战略战术原则，得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科学结论，从而彻底地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论持久战》是毛泽东继《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之后的又一篇最重要的军事著作。它是一部伟大的马列主义文献，是毛泽东对马列主义军事理论的杰出贡献。全文共120小节，论述了21个问题，包括持久战的三个阶段、抗日的政治动员、兵民是胜利之本等内容。这篇文献进一步坚定了中国人民持久抗战的信心，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和具体道路。

二

到1938年5月，饱受战争之苦的中国人民十分渴望战争的胜利。可是，对于战争的过程，以及能不能取得胜利、怎样取得胜利，不少人处于迷茫之中。更消极的是，当时“亡国论”“速胜论”等错误观点甚嚣尘上。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对我国坚持长期抗战将十分不利。因此，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进攻，为了探求指导中华民族取得抗战胜利的方略，毛泽东阅读多种哲学和军事著作，进行理论研究，与实践紧密结合，作出新的理论概括，进而用新的理论指导实践。



单行本《论持久战》。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供图

为撰写《论持久战》，毛泽东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只要在延安能够找到的哲学书籍，他都认真进行研读。因为他深知，在抗日战争中，社会上之所以流传着许多错误的观点，是因为人们看问题的方法是主观的和片面的。因此，毛泽东阅读众多哲学书籍，增加知识储备。毛泽东在读艾思奇的《哲学与生活》一书时，写下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在读李达的《社会学大纲》时，在书眉和空白处留下了上万字的批注；在读潘梓年的《逻辑与逻辑学》时，毛泽东更是一气看完，专门撰文向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进行推荐，并重点探讨辩证法和形式逻辑的关系。

与此同时，毛泽东着重研究军事问题。对中国古代军事素有研究的毛泽东，这时又认真研读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并在延安成立专门的研究小组，采取边读书边讨论的方法展开深入学习。毛泽东留下了大量读书笔记，务求通过研读《战争论》以及其他军事著作，把军事理论问题弄出个头绪。这也是《战争论》中的一些观点在毛泽东《论持久战》中有所反映的原因。当时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延安学术界曾掀起一阵翻译和学习《战争论》的热潮。

《论持久战》通篇充满了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它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客观地、全面地研究和分析抗日战争发生的历史背景和战争进程，始终着眼于战争的全局，研究和分析敌我双方存在的矛盾，以及造成这些矛盾的种种因素，从而科学地预见抗日战争的走向，即：“中国会亡吗？答复：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够速胜吗？答复：不能速胜，必须是持久战。”

三

1938年7月，延安解放社印发单行本《论持久战》，各根据地官兵争相传阅。当月，汉口、重庆、桂林、西安等地的新华日报馆，相继出版铅印订正本。一时间，《论持久战》供不应求，一扫国人心中的迷茫。

《论持久战》不仅对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而且对国民党及其军队也产生了影响。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刚发表，周恩来就将其基本精神向一些国民党高级将领作了介绍。傅作义等人深为赞赏，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武汉会战后的局面，也印证了《论持久战》中所说的“抗日战争必将经历的三个阶段”，即：战略防御阶段、战略相持阶段、收复失地的反攻阶段。随后，经周恩来的同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将《论持久战》中所蕴含的思想“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

《论持久战》在国际上也引起重大反响。当时周恩来从武汉寄了一本给在香港的宋庆龄，请她帮忙翻译成英文。读完文章后的宋庆龄深为认同毛泽东鞭辟入里的分析判断。她找到自己亲近的朋友、记者爱泼斯坦等人，把《论持久战》翻译成了英文，准备在海外出版。毛泽东很重视这件事，为英文版写了序言：“希望此书能在英语各国间唤起若干的同情，为了中国的利益，也为了世界的利益。”《论持久战》在海外得到广泛关注和高度评价，极大地提升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国际影响力。

毛泽东以超乎常人的艰辛劳动和付出，通过深入研究，将丰富的革命战争实践经验升华为高度的理论概括，写出了正确指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实践的光辉著作。《论持久战》回答了当时人们回答不了的问题，解决了当时人们解决不了的矛盾，从而使人们对抗日战争的发展过程和中国的前途命运有了清晰的认识，也大大提高了全国人民坚持抗战和抗战必胜的信念和信心。

东渡赣江传捷报

■宋海峰

军史文苑

如果有人问我最喜欢毛泽东哪首诗词，我会毫不迟疑地回答：《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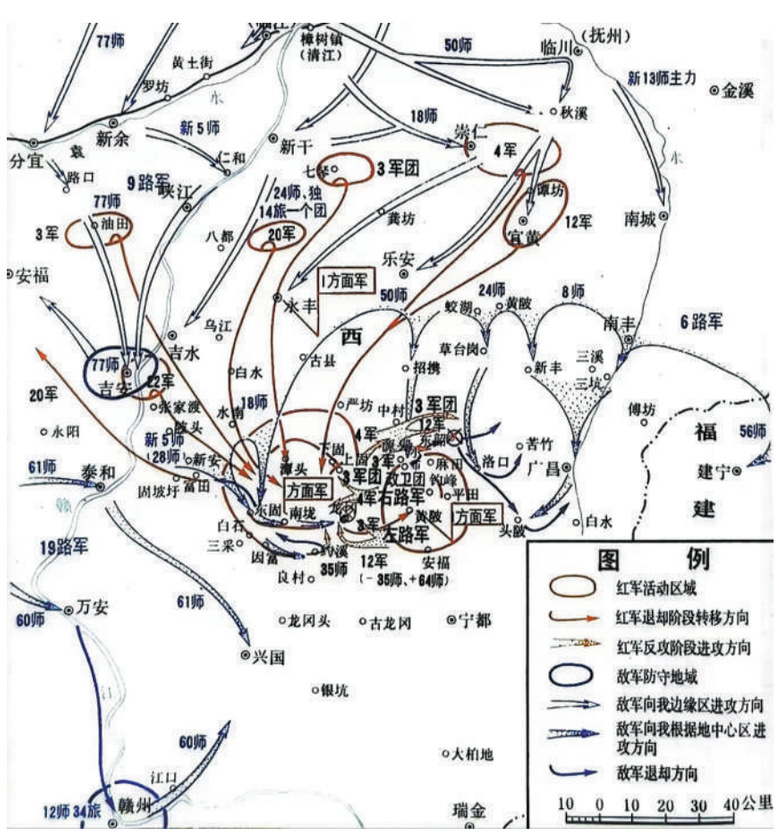
枪林弹雨，化为琅琅诗句。在毛泽东的笔下，这首词定格了一个被朱德赞誉为“红军史上破天荒的胜利”的历史画面，成为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的生动缩影。

行走在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的主战场——江西省永丰县龙冈的崇山峻岭之中，这首词的上阕自然回响在耳际：“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短短五句，就形象地把龙冈的地理环境和军民取得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喜悦之情表现了出来。

1930年10月，蒋介石在取得中原大战的胜利后，随即抽调10万兵力，组织对红军和苏区的“围剿”，企图在3至6个月内消灭红军。这次“围剿”和以往有着明显不同。过去，国民党军针对一省的“进剿”和几省的“会剿”只是局部性的行动；而这次是庞大的反革命军事力量统一起来，重点对“朱毛”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可见，这次反“围剿”的胜败，不仅关乎红一方面军的命运，而且关乎红军全局，关乎中国革命的前程。

为做好即将开始的反“围剿”战斗准备，17日，毛泽东在峡江主持召开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全体会议（史称“峡江会议”），就红军的应战策略、行动方向和根据地的工作展开讨论。

何长工曾在《井冈功业铭千载——回顾毛泽东同志开辟和坚持井冈山革命道路的伟大实践》一文中写道：“在著名的峡江会议上，讨论了两个问题。一、是不是继续攻打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二、过不过赣江及诱敌深入，也就是说反‘围剿’的战场摆在赣江以东革命根据地，还是赣江以西的罗霄山地区。”



红一方面军第一次反“围剿”作战经过要图（1930年11月——1931年1月）。 资料图片

为撰写《论持久战》，毛泽东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只要在延安能够找到的哲学书籍，他都认真进行研读。因为他深知，在抗日战争中，社会上之所以流传着许多错误的观点，是因为人们看问题的方法是主观的和片面的。因此，毛泽东阅读众多哲学书籍，增加知识储备。毛泽东在读艾思奇的《哲学与生活》一书时，写下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在读李达的《社会学大纲》时，在书眉和空白处留下了上万字的批注；在读潘梓年的《逻辑与逻辑学》时，毛泽东更是一气看完，专门撰文向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进行推荐，并重点探讨辩证法和形式逻辑的关系。

与此同时，毛泽东着重研究军事问题。对中国古代军事素有研究的毛泽东，提出，我们不能以卵击石硬打南昌、九江，而是要东渡赣江，到革命根据地内部去关门打狗。毛泽东的意见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拥护，但仍有部分同志不理解。

峡江会议只是揭开了东渡赣江的前奏，一部分同志对东渡赣江仍心存疑虑。为等待一部分同志的真正觉悟，毛泽东在会上没有急于作出决议，而是按原定计划，率部继续向袁水流域进军。

25日，毛泽东在罗坊主持召开了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动委员会联席会议（史称“罗坊会议”），继续讨论在峡江会议上悬而未决的问题。毛泽东根据国民党军阀混战停止后正调集军队向江西根据地推进，以及在全国范围内敌强我弱的基本状况还远未改变等情形，提出不应打南昌，主张红军主力应先向根据地内退却，依靠根据地群众的支援和有利地形等条件，发现和造成敌军的弱点，使敌我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变化；然后集中兵力各个歼灭敌军于运动之中，以粉碎敌军的“围剿”。

经过反复讨论，绝大多数与会成员接受了毛泽东“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罗坊会议确立的“诱敌深入”积极防御军事方针，是红军由游击战转向运动战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没有“诱敌深入”方针的确立，就没有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也不可能有后来第二次、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

恩格斯说得好：“最有效的防御仍然是以攻势来进行的积极防御”。在获悉国民党军已开始对红一方面军和根据地进行“围剿”的消息后，11月1日，毛泽东和朱德在罗坊发布命令，令红一方面军“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灭之”。罗坊会议结束的第二天，红1军团、红3军团即分别从南北方面向巴邱、仁和进发，准备东渡赣江。

但当时部分领导干部关于过不过江意见不统一、作战决心有所动摇。彭德怀在面对这个情况时，以“红军要打遍全中国，不能搞地方主义”为号召，斩钉截铁下定决心，为最终实现东渡赣江的作战部署作出重要贡献。

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同美国记者斯诺谈到红军的历史时说，彭德怀对红3军团一部分人要求红3军团从红军分离出来的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维持了在他的指挥下的部队的团结和他们对上级指挥部的忠诚”。

94年前那个寒冷的冬天，斗志昂扬的红1军团和红3军团官兵，分别从峡江巴邱、仁和一带东渡赣江，奔向第一次反“围剿”的战场，以横扫千军之势，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

此役，红一方面军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在苏区人民支援下，取得了反“围剿”的重大胜利，为粉碎敌人下一次“围剿”创造了有利条件。1931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央给中国红军及各级党部训令》中说：“他们在伟大的中国革命发展史上，已经写上了新的光荣的一页。”

在敌军即将发动第二次反“围剿”之前，毛泽东完成了《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在这里，毛泽东再发雄音，以表第二次迎战之决心。

图文军史馆

『人民英雄连』的战斗风采

■赵前松

1948年3月，西北野战军在陕西宜川取得歼灭敌军近3万人的战绩，一举扭转西北战场形势。敌军为确保西安，急调驻守陇海铁路潼关至洛阳段的第5兵团主力西援，洛阳仅留青年军第206师驻守，洛阳以西、潼关以东铁路沿线只有非正规军守备。

遵照中共中央军委指示，为配合西北野战军作战，并掩护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休整，华东野战军参谋长陈士榘、政治部主任唐亮统一指挥华东野战军第3、第8纵队和晋冀鲁豫野战军第4、第9纵队及太岳军区第5军分区部队，共28个团的兵力发起洛阳战役。

洛阳地扼陕、晋、豫三省要冲，北依邙山，南傍洛河，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为历代兵家所必争。敌军在此筑有永久性工事，以东门为例，门外100多米的空地上设置了铁丝网、壕沟等15道防御工事，城门外加筑瓮城一道。此外，还有大量地堡和梅花堡以地下坑道相连，各阵地之间地雷遍布。但守军兵力薄弱，青年军第206师既缺乏实战经验，又处境孤立。

陈士榘、唐亮原考虑到敌军守城兵力空虚、驰援力量较强、驰援时间较久的特点，遂决心采取速战速决手段，快速歼灭青年军第206师，拿下洛阳。我军部署是：以第3纵队从东、北两面包围洛阳，由东关、北关攻城，重点置于东门；第4纵队从西、南两面包围洛阳，由西关、南关攻城，重点置于南门；第8、第9纵队担任阻援任务。

3月8日，第8纵队袭占偃师，控制嵩山隘路，第9纵队和太岳军区第5军分区部队袭占新安、渑池，分别于洛阳东西两翼占领阻援阵地。9日，攻城部队渡过伊河、洛河，完成对洛阳的包围。11日，未待全部肃清外围守军，我军即发起总攻。

在强大炮火掩护下，第3纵队第8师第22团第1营第1连采取连续爆破、连续突击或以云梯登城等方法进行攻城，打得敌人措手不及。在纵深战斗中，连队官兵与敌开展激烈巷战。指导员王跃月冲在最前面，冒着炮火的重重覆盖冲进院子。他凭借着多年的战斗经验，找准时机将埋伏在窗口的关键火力点机枪手击毙。同时，他利用院子狭小的空间，寻找障碍物，示意战友进行火力掩护。敌军火力逐渐被压制，王跃月带领官兵乘胜追击，歼灭大量敌人。

副连长杨松昌带领一个排，采取突然奔袭和强攻相结合的方法，向数倍于己的敌人发起攻击，战士迅猛的进攻打乱了敌军的阵脚。杨松昌见状命令大家将事先准备好的手榴弹一起向敌人扔去，机枪手随后对逃跑的敌军进行扫射。敌军已无心再战，向着敌长官公署逃去。杨松昌带领战士一路追杀，直到敌长官公署附近。最后俘敌100多人，我第1连官兵士气大涨。

战士张德胜和李文瑞利用夜色以及敌人夜晚警戒松懈时机，将地堡周围铁丝以及障碍物秘密拆毁。随后，两人用炸药包堵住敌人一个大地堡的洞口。并将预先布设好的炸药包引燃，瞬间将堡内的敌军消灭。

第4班班长王玉德机智勇敢，凭借着过硬的素质，提前对西院进行勘察，趁着天黑，将炸药放在西院房屋的周围。待到时机成熟，他起爆炸药，房屋被大量摧毁，敌军伤亡惨重。

与此同时，战士胡士奎等人主动请缨，在火力的掩护下，潜伏到敌人左右后两侧并对敌火力点进行打击。敌军腹背受敌，溃不成军。我官兵最终俘敌副团长以下百余人。

洛阳战役中，第1连官兵激战两夜，歼敌1000余人，缴获大量战利品，为后续部队的进攻开辟了道路。

洛阳战役是人民解放军挺进中原以来对敌坚固设防的中等城市发起的攻坚战，歼国民党青年军第206师及保安团等部共2万余人，俘师长邱行湘。

战后，华东野战军司令部、政治部授予第1营第1连“人民英雄连”荣誉称号。在漫长的革命岁月里，该连涌现出“爆破大王”马立训等百余名英模人物，并获得“突击模范班”等荣誉。

华东野战军司令部、政治部授予第1营第1连的“人民英雄连”荣誉奖旗。 资料图片

军史发现

长征

第6063期

本版学术支持：褚 银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34号 邮政编码：100832 查询电话：(010)66720114 发行电话：(010)68586350 定价每月20.80元 零售每份0.80元 承印单位：解放军报社印刷厂